

## 专题

← (上接13版)

料证据,由破而立,证实桃花源故事本流传于南方本地,所谓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并非坞堡组织,而实际上只是居住于山险之中的山越民族。比较而言,《质疑》一文的后出转精,解释更为合理和圆融,继承并推进了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亦成为中古史研究中的典范之作。



东晋 蝉纹金珰



南朝 青瓷莲花尊



三国吴 青瓷羊形插器

南京六朝博物馆藏

田余庆先生在中古史研究中开始有意识地地区别直接史证与旁证,并有节制地使用旁证。在其名著《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11年修订本)中,对于旁证有过一番深入的阐释:“拓跋历史显得单薄,史料遗存少,首先还是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不够丰富的缘故,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的眼光,从史料缝隙中找出由头,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料匮乏和纷乱无绪的年代,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千万不要在这些零星琐碎的东西中,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材料。历史毕竟是发展而来,总有前因后果,总有横向影响,问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辨认它。”在具体研究中,田余庆先生也始终贯彻了这一思路,在其盛年所著《东晋门阀政治》中“王与马共天下”、“桓温先世的推测”等章节,有多处旁证引用;而在其晚年

所著的《拓跋史探》中诸如“子贵母死”问题,鲜卑与乌桓共生关系问题,对于旁证的依重则更为明显。但与前辈学者相比,田余庆先生对于旁证的使用显得更有节制,节制之一体现在他对于反证的重视,他反复强调:“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对于一时无法解释和消化的反证,他基本不予回避,而将反证直接列出供读者做出判断;节制之二体现在行文的谨严和审慎,他从不讳言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尚停留在推测和猜想,在论述中有意识地严格区分直接史料与旁证材料,“砸不死”的问题并不硬说,并时时以“推测”和“旁证”自警。这种严谨而负责的“节制”反而增加了史论的说服

力,使其结论往往难以置喙。

仅以田余庆先生的《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为例,文章首先开宗明义地坦承:“青徐豪霸,史无明文。本文缀合零散资料,敷衍成篇,意在探索青徐豪霸势力的始终,曹丕与他们之间矛盾的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广陵之役的地理背景、历史背景和客观作用等问题,为研究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形势提供参考。”文章首先通过零散史料的爬梳,勾勒出以臧霸为代表的青徐地区豪霸势力在汉魏之际历史中若隐若现,二十余年不时影响政局。曹操死后,驻屯洛阳的青州兵和作为臧霸别军的徐州兵发生骚乱,鸣鼓擅去,成为青徐势力可能乘时而动的一个信号。曹丕代汉,不动声色地调遣力量,以图谨慎

而又果断地解决这一向题。在“利城兵变与广陵之役”一节,作者重点分析魏文帝黄初年间曹丕以伐吴为名,亲自督师远征,连续发动的两次广陵战役。这两次战役虽大耀兵威,却都未与吴军交锋,且行军路线诡异:“不象赴敌,不象屯驻,也不象搜狩”,“只是率领游军,迢迢千里,络绎道途,逡巡高岸”,“它势必旷日持久,劳而无功”。而在两次广陵之役之间,《魏志·文帝纪》却参差地记载着青徐地区动乱和曹丕处理动乱事宜的史料。“这些资料文字简略,不详首尾,裴松之漏注,《通鉴》不录,后代史家无解,卢弼亦无所发明”,作者以此为旁证,做出推断:“联系到青徐地区的历史状况和臧霸夺兵事件,我认为广陵之役并非单纯的攻吴军事行动,它和青徐

动乱问题必有密切关系。”“事情应当是这样的:黄初四年曹丕剥夺臧霸兵权后,臧霸故土青徐地区出现不宁,而且规模不小。所以曹丕于翌年东征途次,在徐州所属广陵泗口颁令赦青徐参与动乱的人,以图平息事端。与此同时,曹丕乘机改易青徐将守。”“如果把广陵之役同青徐豪霸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事情就可以看出一些眉目。广陵耀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于江淮地区来而复往,这十分可能是对青徐豪霸势力的强力警戒行动。广陵耀兵不足以威慑孙吴,而足以威慑青徐豪霸。”在广陵之役的掩护下,曹丕终于以武力彻底平定了这支魏国东部的地方势力。虽然史籍中关于广陵之役与利城兵变的关

(下转15版) →

## 从史料到云史料

姚乐

2017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两校中古史学者凡二十余人,会聚于南京六朝博物馆,召开主题为“文献·文书·文物: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的学术研讨会。我也有幸“躬逢胜饯”,呈文参会并担当评议。

会议除去前后的室外考察,正式的讨论历时一天半。双方学人如此小范围、近距离、长时间的集中交流,至少于我来说,还是初次体验。在青年一辈研究者中,我属于比较“宅”的,十多年间,基本只是通过书本和网络接触北大史学名贤。此番提交的报告得到陈苏镇老师的点评赐正,这份荣幸颇出意料之外。八年前参撰《江苏建置志》时,为弄清西汉前期封国的行政层级,我曾学习陈老师的《汉初侯国隶属关系

考》与《汉初王国制度考述》;前年访学日本期间,兴趣转向六朝职官,又将陈老师近三十年前的旧作《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找来研读。而当面请教,还是头一回。同样的,在2005年浏览“往复论坛”时,我便跟踪过罗新老师的帖子,后来又关注了他的新浪微博,但也从未如本次一样,当面听他讲述史学理论。

研讨会的副标题,是“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究竟何为“中古”,国内外至今缺乏统一标准。有将中古等同于魏晋南北朝的,有以“五胡乱华”到中唐作为中古的,也有把东汉当成中古起点的。就本次会上宣讲的九篇文章来说,研究对象所处年代均不出公元3至9世纪的范围,而以六朝(孙吴与东晋南朝)为侧重,这是因为会议在六朝都城

召开的缘故吧。

最 紧扣会议主题的报告,当推于溯的《行走的书籍:中古时期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文章开头概括了中古史料的特点,那就是比秦汉以上有余,比唐宋以下不足,盖其时纸张书写业已盛行,而雕版印刷尚未普及,遂导致记诵作为一种文献传播的辅助手段,在当时大为风行,备受推崇。业师胡阿祥常说,先秦文献是芝麻当西瓜用,明清文献则是西瓜当芝麻看,六朝文献体量适中,西瓜便是西瓜,芝麻便是芝麻。中古文献虽较上古丰富,但从清初以来,经过学者们历时三百多年的持续“耕作”,由十二部正史和《通典》《通鉴》构成的核心地块,“肥力”已近枯竭;《搜神》《世说》《文选》《玉台》《伽蓝

记》《水经注》,乃至佛典僧传、道藏图书,自史学理念“近代化”以来,也被人们从多种角度介入利用;碑碣、简牍、器物、遗迹,一经公布,敏感的研究者们都会立刻蜂拥麇集,各取所需。边边角角的处女地难遇难求,发现新大陆无异痴人说梦。基于一眼见底的史料储备,如何制造中古史知识的新增长点,是当今史学工作者不能不为之焦虑的问题。

正史典章,姑名为一类史料;其他传世文献,姑名为二类史料;出土材料,姑名为三类史料。一类史料最为常见,前人的点校注释已颇充分,易于入门,利用难度却越来越大。因为即便成年累月地投入时间去通读融会,对于中古历史的整体把握,未必就能达到吕思勉等前贤的水准,欲从个别细节探微索隐,试问几人能有唐

长孺先生的沉潜与高明?基于正史诸志和《通典》的专门研究,宫崎市定、阎步克于官制选举,严耕望、祝总斌于央地行政,施和金、胡师阿祥于政区地理,各已“先据要路津”,礼仪、兵制、财政,都早有系统论著问世,如今再有施設,很难跳出前人规模,多不过是小修小补。大到社会性质,小到税收办法,争讼不已的问题虽多,但倘无铁证可供定案,一味叠床架屋地纠缠下去,实无趣味可言。

要之,使用传统视角开发此类习见史料,边际成本高悬不下,吃力不讨好。于是,新的研究路数应运而生,近来我辈年轻人中大热的“历史书写”便是代表,俨为时下显学:既然文献记载难于导出新知,那不如就以文献本身的

(下转15版) →